

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

马学强

【摘要】“扫叶山房”是江南一家历史悠久的书坊,从明清到民国,刻印了大量书籍,在近代“其出版各种古书之多,为全国同业之冠”。许多版本流传至今,在中国出版界享有很高声誉,对保存传统图书典籍起过一定的作用。扫叶山房的主人便是江南的席氏家族。席氏家族以经商起家,素称殷实,其子弟博雅好古,尤嗜收藏,藏书、读书与刻书相连,这个家族营造了一方浓郁的书香氛围。本文围绕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的关系,依循着这家著名民间出版机构的演变,探讨家族文化与人文传承问题。

【关键词】席家;扫叶山房;连续性;人文传承

【中图分类号】K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6—0011—12

【作者简介】马学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0233

近年来,学界对明清时期书籍、出版史的研究逐渐摆脱了对印刷出版技术的关注,而愈来愈多地将视野拓展到社会与文化领域。中外学者重视明清时期的书籍史至少出于两个动机,或者说注意到两个现象,即:(1)从前的中国书籍史研究,多从技术史的角度切入。这种书籍史研究,“不外乎是科技进展的历史,架空了书籍印刷的社会背景,也看不见书籍出版对于社会的影响”。(2)为了修正传统欧美书籍史研究的论述,因为“在欧洲书籍史学者的笔下,传统中国所惯用的雕版印刷,犹如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的象征。这样的论述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所以,一些学者要深入研究明清书籍史,以此“反驳这一类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大家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举凡书籍与社会,书写、文学与阅读,出版与士人,书籍、知识与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均有所涉及。也有结合专题与具体问题进行讨论的,如有学者通过考察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指出江南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在明清时期有了重大发展。另有学者则对中华帝国晚期出版业的“地域性”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揭示这一概念兼具空间方位与社会结构双重涵义。大家关

详见涂丰恩:《明清书籍史的研究回顾》,载《新史学》第20卷第1期,台北,2009。

如: Kai - wing Chou,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东京:研文出版,2004. Cynthia J. Brokaw, Chou Kai - wing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国内也有多位学者的研究涉及明清时期的书籍史,如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详见涂丰恩:《明清书籍史的研究回顾》,载《新史学》第20卷第1期,台北,2009。

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该文认为由明及清江南地区的印刷出版业经历了四大变化:(1)在明代,官营出版印刷业在江南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清代,则是私营出版印刷业占有绝对的优势。(2)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广,其次是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与改进。(3)在明代初年,政治性和教化性读物在江南出版印刷业产品中占有很高比重。明代中期以后,以牟利为目的,面向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日益发展,到了清代则已成为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流。(4)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出现了“外向化”的趋势,即生产所需的原料(纸张等)要依赖外地供应源,而其印刷品则依赖外地市场。

【美】梅尔清著,刘宗灵、鞠北平译:《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载《中国近代史》2009年第5期。

注点不同,视角各异,以此拓展明清书籍史、出版史探讨的领域,深化相关研究的内容。本文所要考察的是一个出版机构及与一个家族的关系,这个出版机构就是扫叶山房,那个家族就是苏州的洞庭席家(为行文方便,我们有时也称“江南席家”或“席家”),考察的时段从明清延续到民国。

席家自唐代后期从北方迁居江南的太湖边,聚庐托处其间,子姓蔓延,逐渐成为洞庭东山大族。明代以来,席氏家族在商界的声名渐起,涌现出不少富商大贾。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席家子弟也不输文彩,不少人在诗词、书法、藏书、印刷出版诸领域颇有成就。其中,席家人创办的扫叶山房名扬海内外。席家人创办的扫叶山房,历经数个世纪,从传统的雕版印书,到近代的石印、铅印,它都经历过,是中国民间历史最悠久的印刷机构之一,出版过大量的古籍文献。已有的关于扫叶山房的论述,大多从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角度来审视。而从席氏家族变迁与文化遗产的关系来探讨,对扫叶山房的兴起与发展则另有一番解读。

一 “扫叶山房”的早期历史

扫叶山房究竟由谁设立,具体创建于何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曾有人简单梳理了扫叶山房的发展脉络:

上海未开商埠前,书业盛在苏阊,而以扫叶山房历史最久:远在明万历年间,松江席氏买下有名的毛氏汲古阁二十二史等书板,与苏人洪、谢、陆三人合资在松江开办扫叶山房;不久移设苏州阊门内,同治间设分店于上海彩衣街,并设木板印刷所于东唐家弄。

关于扫叶山房的创立有几种说法,归纳起来有:明万历说;明末说;清初说。这些说法各有依据。综合起来,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以“扫叶山房”为肆名,初创于明代后期的松江、苏州,由洞庭席家子弟与他人合伙经营,取古人“校书如扫落叶”之义。其间,翻刻了一些书籍,生意尚好,在书业有一定影响。明清之际,受局势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一度沉寂。到清康熙年间,席启寓、席鉴等刊刻图书,仍借用席氏先人的“扫叶山房”之名。到乾隆年间,在社会上的影响逐渐扩大,版本流传亦多。清代,席氏经营的扫叶山房以雕印为主,印制文献达数百种。孙毓修谓:“清时书坊刻书之多,莫如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如《十七史》、《四朝别史》、《百家唐诗》、《元诗选癸集》,其最著者。”一时,“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席氏刻书尤重校刊,讲究质量,颇有声誉,影响较广。

扫叶山房与洞庭席氏家族联系在一起,此无疑。关于席氏家族,我曾撰写《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一书,对这个家族的变迁进行了详细论述。一个经商的家族,为何会创办书坊,经营书籍,这与这个家族的家风与其子弟志趣有关。在这里,首先要提到一个人与一本书。这就是席洙与他的《居家杂仪》。

在洞庭席氏家族中,有一个人经常被族人提及,他叫席洙。席洙,字子文,号怡泉,明正德十一

据叶九如述,载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 1954年版,第373页。

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第27页。

见拙著《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观洞庭席家之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从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至元末明初。席姓原来长期生活在北方地区,因发生黄巢起义,中原战火纷飞,为避战乱,席温携子南迁至洞庭东山。其子孙后代秉承始祖席温立下的“不出山、不为官”,以耕读为主,隐居于东山。这五、六百年可以称之为洞庭席氏的“隐居时代”。(2)从明代中叶开始(大约是16世纪),一直到清代中期(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席家人大量外出经营,其经商路线基本集中在沿长江、沿运河一带,席家子弟的迁徙地点也基本与此吻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三百年是洞庭席家在沿江沿河的“经商时代”。(3)从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席家发展的重点在上海,从事于各种工商活动。这一百年是席家历史上辉煌的“上海时代”。(4)从1949年至今,又经历了60年,席家人散居于海内外,地域分布更广,其职业也千差万别,不再以经商为重点。

年(1516年)生。在洞庭席氏家族中,他为第27世。席洙以居积起家,多年经营,颇有资产。与一般的商人不同,席洙熟读诗书,在有了一些家产后,更安心于读书,修身养性。《吴县志》称他:“孝友醇谨,达观身世,读书自乐”。席洙对家族的贡献,不在于积攒了多少钱财,也不在拥有多大权势,而在于“立言”。他集数年之力,用心编写了一部名为《居家杂仪》的书。为何要撰写此书,他有一段说明:

夫人以一身而应万事,必有礼以节之,然礼不可僭议,俗未易遽更。予,山之鄙人也,惟以身先之而已。于是自冠婚丧祭以至日用常行之所宜者,纂而集之,名曰《居家杂仪》。杂者,言其大略也……凡我族众,其盖从而守诸。

这部书主要是讲礼仪,让族人“从而守诸”,所以被后人视之为“席氏家训”。《居家杂仪》成书于万历元年(1573年),第二年,席洙自撰后序。全书分上、下二卷,计121条。《居家杂仪》成稿后,先是在族人与当地士人中流传,深受好评,一些人为之作序。曾任两京国子监祭酒、后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的姚弘谟,于万历七年(1579年)亲自为之作序。历任监察御史、太仆寺卿两台督学的徐燠等官员也对《居家杂仪》给予较高评价。

席洙的《居家杂仪》,其名称直接沿用了在后世具有广泛影响的北宋司马光所编之《居家杂仪》,其内容也颇有继承性。结合明代各地一些家族所纂修的家谱族规,可以看到其内容具有相似性,这与明代乡约的推行及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等背景有关。当时有不少家族即依据乡约条例来规范本族的行为,宗族的乡约化成为一种趋势:“宗族乡约化,是指在宗族内部直接推行乡约或依据乡约的理念制定宗族规范、设立宗族管理人员约束族人。它可能是地方官员推行乡约的结果,也可能由宗族自我实践产生,宗族乡约化导致了宗族的组织化。”在洞庭席家后来所编的一部家谱中,其中一卷就是在席洙的《居家杂仪》后附录了“宗法考”、“乡饮酒礼考”、“纂训”、“普劝积粟备糴保安地方说”、“义塾劝戒条约”等。从附录的这些文本内容来看,有的选录历代文人有关宗族、宗法的言论,有的则摘抄其他家族的家训、家政、族规等内容。可见,这些家法族规在当时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席洙在依据先贤言论、参酌古礼、借鉴其它家族之礼法族规的同时,也从本地、本族的风俗人情、日常生活中归纳,有的还是从自己的亲身实践概括的。如“教子读书”中写道:“凡幼稚之时,初入学必从明师开蒙,庶句读皆得其正。四书本经,务令熟读,颇知文意,即与讲解,他日学为文字自然豁达……凡我山乡,但有二三子,可将一子稍敏者专于读书,昼夜苦攻,必有成者。然后讲建书馆、延师长、勤学习,还谈到如何教育女儿,以及如何教子营生等问题。在“教子营生”中有一段:“凡生子未冠之时,上不能攻书,下不能务农,年不及十五六岁,须烦亲识带领出外,早学生理。自幼琢磨,庶肯受人之教,他日必有成也。”这些做法都比较符合实际。

席洙在《居家杂仪》中传达的总的意思是鼓励子弟读书,但不能业儒者,即去经商。这种重读书、重经营的观念在后来的席家子弟中得到了落实,不去科场,即去商场;不能攻书,就去经营。并进而演绎为席氏子弟的两条路径:求富(经商)与求贵(读书)之路。阜通货财为商贾,倒卖贩运,以趋利为旨趣;学以居位曰士,读书做官,以清高相标榜。数百年来,追求“清贵”的那些席家子弟,喜欢藏书、刻书、读书、著书。正是在这种家风族规的熏染下,扫叶山房应运而生。

参见《吴县志》卷70上,“列传孝义一”。

载《席氏世谱》(木册)。

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撰写《居家杂仪》所言之“杂仪”,并非指人们在家居时的一般习俗礼仪,而是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应遵守的规范,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份家规。南宋时,著名学者朱熹将此收入到他编著的《家礼》,《居家杂仪》遂广为流传。

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参见(明)席洙:《居家杂仪》,载《席氏世谱》(木册)。

在扫叶山房的兴起中,有两位人物非常关键,其中一位就是席启寓。席启寓,字文夏,号治斋,乃明末清初著名商人席本桢四子。生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席启寓6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他从小就经历了丧父之痛。由于席本桢在地方上极富威望,所以席启寓还是在很多地方得到了庇荫。从小读书,后为监生。席启寓人生有两次重要转向,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家族影响也很大。

第一次是辞去京官,回到江南,过着亦商亦文的生活。约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席启寓由县令积资得部郎,二年后补工部虞衡司主事。虞衡司乃工部所属四司之一,掌度量衡制度、官司器用制造以及军装、军火、旗帜之制造、核销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传来三哥启疆病故的消息,他极为悲痛,转而又想到老母年迈,顿时萌发辞官之念。在做了四年京官后,席启寓为奉养母亲,毅然辞官返乡。

回到家乡,席启寓那时毕竟只有三四十岁,在江南做些什么呢?从文献记载来看,他除伺候好母亲外,主要做两类事情。一是经商。开设了几家店铺,如在常熟“质贷而减其息,人咸乐趋之”。二是读书。闲时读书,悠然自得。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他做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选择,即举家从洞庭东山迁居常熟。

席启寓为何要迁往常熟,这有多种原因,其中有经商的因素,在常熟有店铺。还有多次是为了修家谱,曾往返于东山与常熟之间。席启寓是个热心家族事务的人,见父亲当年所辑的家谱已过了四十多年,且席家分支日广,子孙蔓延,亟待重新修订。于是,他四处联络族人。后由席启寓主持,与族人一起续修了《席氏世谱》八册。《席氏世谱》八册刊刻于康熙年间,承前启后,特别是把一些分支也与总谱相连。就在修谱的同时,他经常去常熟等地,那里也是席家子弟的重要集聚地。

另一方面,也与席启寓的识见有关,他看到了常熟的藏书之富。启寓15岁结婚,第二年,母亲与几个哥哥商量,分家析产,启寓也得到了一份丰厚的财产,其中,有一份家产就在常熟县城南。那时,启寓就觉得东山僻处湖中,读书服贾不甚方便,“见闻不广”,而常熟人文荟萃,特别是藏书丰富,海内闻名,“吾邑自明五川杨氏以藏书闻于时。厥后秦西严、赵清常辈继起,皆以购访古籍为事。至绛云而集成,其储藏之富,讎勘之精,称雄海外。”此后,“四方之名士,书林之贾客,挟秘册访异书……络绎于虞山之麓,尚湖之滨。”虞山、尚湖在常熟之境。富有远见、喜爱读书的席启寓遂有“卜居虞山之志”。

从京城归来不久,启寓征得母亲同意,择常熟南城旧第而新之,先立祠堂,后又陆续开设商铺、典当。他的母亲也喜欢常熟,经常往来于两地,“板舆往来虞仲、莫厘两山间,春秋佳日,命驾出游”,其乐融融。在常熟的新居,席启寓题其堂曰“娱晖”。

席启寓做过官,回到江南也一直在经商,但他更愿意把自己当成文人。他广交朋友,所交挚友也大多是文人。他与当时江南的许多文人有交往,“少问业于华亭叶有声,及长,与朱彝尊交,士林称之。”其姻亲中也不乏名士,席启寓的妻子吴氏,就是吴伟业的妹妹。吴伟业,苏州太仓人,字骏公,号梅村。少时受业于张溥,擅诗文。明崇祯进士,授编修等职。参加复社,是晚明时期的一个活跃人物。入清,充清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迁国子监祭酒。后归里,博学多才。吴梅村经常到东山、常熟等地探望妹妹、妹夫及他的外甥们。席家有很多亲友住在青浦,吴梅村也多次前往青浦。其实,吴梅村早与席启寓相识,清初吴梅村为国子监祭酒,启寓还是一位监生,称弟子,后来娶其妹妹,才改称长兄。后来吴梅村的一个女儿又与席启寓的长子永恂成亲,更是亲上加亲了。

席启寓与陆陇其的交往,在当时士人中传为一段佳话。陆陇其,浙江平湖人,原名龙其,字稼书,人称当湖先生,康熙进士,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后辞官。平生服膺程朱理学,其学行闻名一时。

(清)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2,“爱日精庐藏书志序”,光绪甲申虞山后知不足斋刻本。

(清)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2,“藏书二友记”,光绪甲申虞山后知不足斋刻本。

《洞庭席氏支谱》。

《洞庭席氏支谱》。

嘉庆《珠里小志》卷11“人物上”。

自退休后,向居青浦珠里(今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席启寓慕陆陇其之名,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备上厚礼,延请到家,课其二子,即永恂、永恪(前席)。陆氏歿,厚葬之,并聘其孙女为席永恂长子祐镐之妻。陆陇其留下了数种遗书,皆为平日读书心得,凝聚心血,席启寓毫不犹豫,集其遗书,捐资全部刊刻于世,一时纸贵。

席启寓本人博览儒籍,亦爱读道家之书。工诗,“寄趣在元白韩李间”,所著有《治斋诗甲乙集》。读书、藏书、刻书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席氏家族生活优裕,博雅好古,尤嗜收藏和刻印。他在常熟书室名为“琴川书屋”。康熙年间,常熟毛氏汲古阁书版散出之际,席启寓购得了不少好版本,于是大量翻刻。后有汲古阁版《十七史》行于世。每从坊间购得唐集宋版书,他必亲自校对,雕刻行世。

席启寓后来名声大振,还与康熙皇帝的一次南巡有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四月初三,康熙南巡至苏州,晚起更时传旨:定于明日去东山巡视。康熙一行到东山,即驻跸于翁巷南花园弄东席启寓家东园。这个东园,就是席启寓父亲席本桢在明末王鏊的招隐园别墅基础上扩建的。康熙少歇,随即召见东园主人席启寓,问:“有何官职?”启寓回奏:“曾任工部虞衡司主事。”康熙又问:“你年纪不大,为何不来京供职?在旁的巡抚告诉康熙他在家养亲。这时,席家人向皇上进新山茶。康熙坐在厅内,周览久之,还问席启寓在家做什么,继奏:“暇读唐诗,蒔种兰花。接着向康熙进自刻的《百家唐诗》四套及蕙兰二缸。康熙笑纳。康熙驾幸东园,接见席启寓,此事在当地盛传一时,“乡党荣之”。以后也成了席家世代相传的一段故事。母亲延氏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去世,享年86岁。二年后,席启寓亦卒,享年53岁。常熟县士民呈请巡抚学政汇题崇祀常熟乡贤祠。

“藏书之风气盛,读书之风气亦因之而兴”。藏书、刻书,与读书之风相得益彰,席启寓为他的家庭营造出浓郁的一方书香氛围。席启寓时,藏书已有一定规模,并刊刻了不少书籍。康熙南巡时,他进呈的《百家唐诗》就是自刻的,得到皇上赞许,一时名声大噪。席启寓有二子一女:二子即永恂、永恪,当地方志中均有传记;女儿嫁给了浙江海宁县陈世安之子、后官至直隶河间府知府的陈克隆。席启寓的孙子席鉴,酷爱收藏图书,使常熟席家的藏书规模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海内闻名。席家所刻古今书籍,板心均有“扫叶山房”字。席启寓的后代大多居住在常熟,这一支席姓子弟崇尚读书,有的考中进士、举人,如席钊、席煜,中进士;席鏊、席世昌等,为举人。清代著名女词人、被誉为“清二百余年闺阁中之俊才”的席佩兰,就是席鏊的孙女。为官者也不少,席启寓的孙子席雍,累官至陕西督粮道、按察使司副使、刑部左司郎中;另一个孙子席襄,曾任两浙盐运使司副使。

席家经营的扫叶山房在乾嘉年间名声崛起,这与席家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有关,他就是席世臣。

席世臣,字邻哉,一字郢客。席启寓是他的曾祖父。在洞庭席氏的家谱上,席启寓(30世)——次子席永恪(后改名前席,31世)——三子席襄(32世)——绍容(33世)——长子席世臣(34世)。席世臣的祖父叫席襄,字成叔,号蓼塘,他与藏书家席鉴是堂兄弟,都属于“祐”字辈。席襄曾任浙江金华府汤溪县知县,后升两浙盐运使司副使。在席雍的时候,他们已从常熟迁居珠里(朱家角镇)。父亲席绍容,字敬堂,号守朴,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是一名贡生。历任户部山西司、浙江司员外郎。据称,他慷慨好施,周恤亲族,有其祖父席启寓之遗风。世臣的母亲蒋氏,出自名门,娘家人登甲、乙科者不少。蒋氏严格教子,“寓慈于严,未尝存姑息”。

席世臣的先辈虽由常熟徙居青浦之珠里,但世臣在诸家书序、自序、题名,均仍写“常熟籍”。席

参见嘉庆《珠里小志》卷13“流寓”,并见民国《吴县志》卷70上“列传孝义一”。

详见(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及《席左源公支家谱》卷2。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

《席氏怡泉公世系支谱》。

清嘉庆《珠里小志》卷18记载,“席氏寄籍我里百有余年”,席襄去世、治丧也在珠里。

见席世臣撰:《皇清诰封恭人显妣蒋恭人行状》,载《洞庭席氏支谱》。

世臣气宇伟然,吐属隼雅。为人慷慨,喜周济他人,遇到有才士贫困者,“岁时馈遗,积久不稍懈。”关于席世臣的人物事迹,常熟、青浦两地的志书都有记载。因籍贯是常熟,故在青浦县为补商籍学生。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参加乡试,因中途生病,未终场而退出,名落孙山。后游学京师,蒙《四库全书》总裁大臣推荐,“充钦颁江浙两省文汇阁等处三分书”(分校《四库全书》三分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钦赐举人,后候补主事。

席世臣好古嗜学,家富藏书。因家资丰裕,所得善本,多为梓行。明清时期,不少藏书家同时也是出版家,藏书、刻书不分,然而,藏书、刻书毕竟分主次,有侧重,从席世臣的情况来看,他是重在刊刻流传。世臣此后一直专注于书籍的刻印,所刊书皆亲自雠校,颜其书室曰“扫叶山房”。其所刊书籍,板心亦多有其字。曾刻《宋辽金元别史》,其友阮元为之序言。席世臣几次刊印的书籍在市场上颇有销路,于是,他在苏州阊门内开设了书坊,即以所居室名之。

席世臣开设书坊,兼具了许多有利条件:一有家学,数代积累,藏书丰富;二是交游广泛,师友众多;加之本是文人出身,又曾在《四库全书》馆任职,懂版本,知道所刊印书籍的价值;三为席氏以经商起家,深悉经商要义,在坊间刊印的书籍也是商品,本身需具有价值,但还要取决于市场,要了解读者的兴趣,读者的层次,所以经销的方式、手段也很重要,自明中期以来,席家一直经商,耳闻目睹,席世臣经营书坊自然也很有一套。

另一个背景也不容忽视,这与清代苏州作为全国著名文化中心和科举人才中心有关。清代的苏州,刻书印书兴盛,时文选本名气响,文士活动频繁,图书销售具有很大市场。清代刻书,吴、越、闽三地皆为重地,苏州因刻书质量优、价值高而享誉海内。清代苏州出现了数十家闻名遐迩的书坊。苏城书坊一业,还成立了公所,订立了相关章程。清康熙十年(1671年),苏州书业同人捐资建崇德书院(崇德公所),供奉梓潼帝君,“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从中也可见当年苏城书业之兴盛。

其时,席世臣经营的“扫叶山房”因规模大,名声响,引来各方关注。同行中,嫉妒者有之,愤恨者有之,假冒者也有之。有人曾别开一店,称“卷席斋”,意欲席卷“席”氏而代之。而更多的仿冒,因为“扫叶山房”的版本有销路,有人就假冒翻刻,犹如当今之“盗版”。还有人别出心裁,如有人开设了一家“扫松山房”,把“松”字写成古体,与“叶”字相仿,试图以此打开自己书籍的销路。

清乾嘉时期,席世臣经营的扫叶山房刻印了大量书籍。据统计,其所刻书有:《大唐六典》30卷、《贞观政要》10卷、《东观汉记》24卷、《旧五代史》150卷、《契丹国志》27卷、《大金国志》40卷、《古史》60卷、《东都事略》130卷、《五代外史》7种(此7种为宋陶岳《五代史补》、宋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宋尹洙《五代春秋》、唐司空图《诗品》、梁钟嵘《诗品》、宋无名氏《五代故事》、王朝梧《重刻四库全书辩证通俗文字》,计13卷)、《钱塘遗事》10卷、《元史类编》42卷、《西汉年纪》30卷、《南宋书》68卷、《增补字汇音释》4卷、《容斋随笔》16卷、《二笔》16卷、《三笔》16卷、《四笔》16卷、《五笔》10卷、《元经注》10卷、《元诗选·癸集》20卷、《内经知要》2卷、《词律》20卷、《泰西水法》3卷、

嘉庆《珠里小志》卷12,“人物下”。

详见《重修常昭合志》、嘉庆《珠里志》、光绪《青浦县志》等。

清代苏州计有书坊五十余家,“书坊可考者”有:赵氏书业堂、宝翰楼、振邨堂、绿荫堂、穆大展局、经锄堂、文粹堂、文英堂、文裕堂、文林堂、文喜堂、文渊堂、三经堂、三友堂、三元堂、四美堂、三味堂、柱笏堂、仁寿堂、桐石山房、同文堂、同青堂、兴贤堂、春阳堂、崇本堂、惟善堂、萃锦堂、传万堂、观承堂、楠槐堂、采莲堂、聚盛堂、王氏聚文堂、西山堂、学耕堂、鸿文堂、函三堂、聚文堂、振文斋、讲德斋、来青阁、最新阁、黄金屋、步月楼、黎光楼、岁月楼、谢文翰斋、得见斋、席元章坊、相石山房、席氏扫叶山房、江氏文学山房、志恒书社、宝华堂、宝兴堂。详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3-554页。

见“书业捐资重建崇德公所碑”,载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千金方衍义》30卷、《华氏中藏经》3卷,等等。席家多据武英殿本重刻,表现出主人具有的独到眼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扫叶山房付刻《元诗选》。此为元代诗歌总集,由清代顾嗣立编选。顾嗣立,字侠君,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进士。苏州顾家与席家有姻亲关系,顾嗣立是世臣祖母顾氏的堂叔。世臣从小跟随祖母、父亲,去过顾嗣立府第多次,此后,往来甚密。席世臣的父亲是顾氏的门生,世臣应该算是他的再传弟子了。顾嗣立辑元诗,拟分初、二、三集,每编再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集,另以癸集收录零篇断章、不成卷帙之作。顾嗣立在《凡例》中认为宋以后因刻版盛行,易于流布,所以诗集流传甚多,“连篇累牍,工拙并陈,其势必出于选而后可传”。于是,他花费大量心血,陆续选刻三集,这三集分别刊刻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四十一年(1702年)、五十九年(1720年)。第四集刊刻未竟,顾氏离开人世。此后,世臣父子及顾氏其它门人继续第四集的补编,世臣“补其缺略,镌以行世。”终于在嘉庆三年(1798年)付刻。《元诗选》搜罗甚为完备,有的采用全集,有的根据选本,是至今保存元诗最丰富的一部总集,它是研究元代诗歌以及元代历史的重要数据。《四库总目》称之“有元一代之诗,要以此本为巨观。”

二 扫叶山房的“上海时代”

席家与“书”结缘,数代传承,不断在延续。如果从席洙(27世)算起,中有席启寓(30世),到席世臣(34世),再到席元章时,已是席家的36世。席元章也是经营书业的,在苏州曾有一家书坊就叫席元章坊。席元章,字晦甫,一字冠甫,道光十八年(1838年)参加院试,“以律赋冠一郡,补青浦县学。自后弃举子业,潜心经学小学,旁及天文历算”。一如其先人,广交文友,其中包括海宁的李善兰。席元章爱读书,好藏书,“世业书坊”,在苏州、松江、青浦一带开设书坊,刊印书籍。咸丰年间,清兵与太平军在苏松一带激战,席元章所经营的书坊在战乱中损失颇大,“...有清本而毁于粤匪之乱,学者惜之”。

迫于形势,席家人将扫叶山房迁徙上海,先在县城内设立分号(后称南号),光绪年间,又在棋盘街(今河南中路)设立北号。扫叶山房经营的重点,也慢慢从苏松内地转移到开埠后的上海。近代经营扫叶山房的是席念曾等人,均为洞庭席氏的后裔,他们在籍贯上填写的是“松江”,属席氏松江分支。

近几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古籍流传,有雕版印书、活字印书、手工抄书、石印、铅印等多种方式。近代以前,雕版印书、活字印书(又分金属活字印、木活字印、泥活字印)、手工抄书皆有。近代以来,西方石印和铅印技术传到中国,并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明清时期,扫叶山房以雕版印书为主,享誉一时。迁往上海后,扫叶山房与时俱进,较早采用了新式的石印方法,由此扩大了印刷规模和销售范围。其印刷书籍,仍多刊有“扫叶山房”字。光绪后,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始流传坊间。扫叶山房推出的连史纸线装书,多系石印本,因价廉物美,风行全国,“为古书同业之冠”。除刻印经史子集、古典诗词等古籍外,其碑帖一度营销南洋一带。

近代扫叶山房在全国共有5家:上海2家、苏州1家(阊门内)、松江1家(马路口)、汉口(黄陂

参见《江苏出版人物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清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刻本除《十七史》、《四朝列史》、《百家唐诗》、《元诗选癸集》为其著者外,还有乾隆六十年所刻的《东都事略》(130卷),乾嘉年间刻本《宋辽金元别史》(5种),嘉庆二年刻的《南宋书》(68卷),嘉庆五年刻的《唐六典》(30卷),光绪年间所刻的《御纂医宗金鉴》(15种)等,均有一定声誉。

嘉庆《珠里小志》卷12“人物下”。

详见(清)张锡恭:《茹茶轩续集》卷5“席晦甫先生述略”,己丑(1889年)刊印。

详见(清)张锡恭:《茹茶轩续集》卷5“席晦甫先生述略”,己丑(1889年)刊印。

石印,系指以石头为制版材料的平版印刷术,其法:用药墨将文字写在药纸上,再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板上,然后滚刷油墨,即可把字印在纸上。石印具有价格低廉、制版快速、修正方便的特点。铅印,亦即铅活字排印,其法已与后来的机器铅印方法同。

街)，“本坊开设，只此五家”。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上海的扫叶山房。

1. 关于上海扫叶山房的位置

近代上海扫叶山房有两处，其位置大致不变，但地名叫法不同。晚清时称“设立上洋英大马路抛球场南首及城内”。在1916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中标明，扫叶山房有两处：一处位于河南中路棋盘街，此即扫叶山房北号；一处在大东门内彩衣路，是为扫叶山房南号。

上海福利营业股份公司曾编印《上海市行号路图录》(1939年)，其中在第八图中，可以详细了解棋盘街河南中路一带的出版机构的分布情况：扫叶山房，位于河南中路129号，其南为合众教育用品社(127号)，其北有广益书局(137号)、新亚书局(159号)、中国书局(199号)、文明书局/启新书局(201号)、商务印书馆(211号)、中华书局(221号)，河南中路的另一侧有正中书局(170号)等。河南中路及附近的福州一带，近代出版机构云集，而扫叶山房以出版古籍闻名。

2. 扫叶山房出版的书籍及经营状况

晚清上海扫叶山房曾刊刻大量图书，在一张“上海扫叶山房发兑石印书籍价目”中有这样的文字：“本坊设立上洋英大马路抛球场南首及城内，赐顾者请至本坊，另备书目以便购取，庶不致误”。书目中列有《十朝圣训》(100本)、《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总目》、《文献通考》、《小学三种》、《宋本说文解字》、《海上名人画稿》、《申江胜景图》、《历科状元策》等，计数百种之多。举凡经史子集、古典诗词，扫叶山房皆有刊印。其价格不等，贵者如《十朝圣训》(100本)，洋60元；《大清一统志》，洋56元；《雍正朱批上谕》(60本)，洋40元；便宜的如《王宗师考卷》(1本)，仅售洋1角；《无双谱》(1本)，洋2角。另有铅板的《曾文正公全集》刊刻发行。

从晚清到民国，扫叶山房的经营情况大致如下：扫叶山房北号位于公共租界，由工部局发给其出版业执照(第10号)，经济局商业登记证(第46128号)，开业日期清光绪六年(1880年)，资本3000元，1898年增资2万元，1911年增为6万元，至1942年达到20万元。出版物之性质及内容“经史子集老书等类”，据出售统计，“国学书等三百余种”。业主为席念曾，职员十余人，主要来自吴县、徽州、武进、松江、上海等地。

在1917年上海书业公所的档案中记载：扫叶山房北号，业主(东主)为席念曾，经理为马蓉荪，独资，营业为发行所，地址在棋盘街；扫叶山房南号，业主(东主)为席念曾，经理为席少吾，独资，营业为发行所，地址在大东门内彩衣街。以后，情况稍有变动，如1923年扫叶山房北号，经理为马庸生(苏州人)，扫叶山房南号，经理为顾子安(上海人)。其余保持原状。

据1933至1935年来自国民政府实业部、上海市社会局等对扫叶山房的调查，其情况变化如下：扫叶山房，为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创始于明万历年间，后迁至上海。分设于苏州、松江、上海县城(南市)等地。上海扫叶山房地址设于河南路129号，设备有铅印、石印等，职员15人(多时至20人)，马庸生为经理，王松亮为副经理，经营业务：发行图书，兼营文具。1933年资本总额为12000元，每年营业收入6万余元。

到1945年12月，从“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申请书”中记载来看：扫叶山房北号，资本总额约计200万，独资，营业种类为出版兼贩卖，店员人数12人，地址河南路129号。负责人为席

扫叶山房的广告宣传，见宣统二年石印《毛诗品物图考》内所附。

《上海指南》(1916年)，商务印书馆版，卷6“实业，书坊”。

参见周振鹤编著：《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

参见周振鹤编著：《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400页。

据上海特别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书店概况调查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3-1-66等。

据民国六年丁巳秋季调查同业一览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3-1-23等。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3-1-62。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3-1-24、S313-1-128等。

念曾,其会员代表有席仰高、席与晟、马庸生等。在相关档案数据中,席念曾、席仰高、席与晟等籍贯,均注明为“松江”,其先人从洞庭东山迁徙而来。

作为刊印、发行古籍为主的专业书店,扫叶山房在近代经历了多次危机,既有政局变动,又有社会经济恐慌,还有战事破坏。其中较为严重者:一为科举制度的废除。晚清科举废弛以后,营业每况愈下。“该局资本,为古书同业之冠,总计三万五千余元,出版各种古书之多,亦为全国同业之冠。该局创于清光绪年间,当时科举未废,每年营业,恒达百万元。民元以还,营业逐年减少”。扫叶山房曾出版发行大量与科举考试有关的书籍,如《制艺精华》、《历科试策大成》、《历科状元策》、《四六新策》、《临文便览》、《空策利器》、《小试利器》,等等。一朝制度改变,基础动摇,这些流传在坊间的文本顿时失去其价值,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与科举制度密切相连的古籍刊印也一落千丈。二遇社会经济恐慌。1935年间,局势动荡,古书业深受影响,除较有史料性质及哲学等书,稍有销路外,“经史子集销额极微”。此对扫叶山房调查论述如下:“近年百业凋敝,致销数益减。该店现并兼营扇册书画等物,勉图增益。其出版除刻印木板经史子集、古典诗词等书籍外,以碑帖营销较畅,销路首推南洋一带。去年营业总值,计五万四千余元。”其他如校经山房、尚古山房、文瑞楼、鸿宝斋等,其资产、营业均不及扫叶山房。三为战事影响。1937年8月,侵华日军连续轰炸南市一带,扫叶山房南号(也称老店)在战火中毁没,其产业无存,“损失现金约在五六万元”。

近代出版人经营古书业,值得一提的还有版权问题。所谓古籍,多为古人所撰,但有版本等权属,近代出版业发达,翻印图书极其便利,于是,就有了版权纷争。早年上海有书业公所之成立,其背景就是为了保障同业利益,而同业利益中就有一项是关于“翻版涉讼纠葛”。上海书业公所的历史可追溯到清代的苏州,“书业崇德公所,创始于苏州,成立于前清中叶,有碑石可考,至今仍谨守前规勿替。咸丰庚申,苏遭兵燹,同业多避难来沪,同治甲子,苏城规复,时正上海海舶初通,商业蒸蒸日上,我同业初作避地计者,至是而竟久居焉。自后各省之业我业者,亦贩运来上海,于是上海书业遂独盛。”可见,近代上海的书业公所与前面提及的苏州崇德公所,也有一定的渊源。1900年以后,“庚子以还,兴办学校,教科用书,著译图籍,有日兴月盛之观,于是版权生焉。书业商会之设,盖保同业之版权,为同业谋幸福,成立以来,功效昭著。”为保障同业之版权,筹设书业商会。成立于1905年的书业商会,由俞仲还、夏颂莱、席子佩、夏粹方、陆费伯鸿、赵连人、楼卓儒、丁芸轩、应季申、吴秋坪等十余人发起,会所择定公共租界望平街,举俞仲还为会董,夏颂莱、席子佩为副会董,何澄一、陆费伯鸿、楼卓儒、夏粹芳为评议员,随后立案注册。

书业商会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持版权。在该会的一份报告中,特别提到:“版权之事,我国向不尊重,贪利者流往往剽袭成书,冒仿翻刻,恬不知耻。本会成立,力主维持,凡遇翻版事件,靡不调查确实,剖别真伪,劝戒兼施,主张公道。社会上始知版权受法律保护,凛然罔敢侵害,书业因而大进。”

作为“古书同业之冠”的扫叶山房,在近代翻印了不少古籍,为保存传统图书典籍起过很大作用,但上海当时有多家类似的书坊,如校经山房、尚古山房、文瑞楼、鸿宝斋等,均以经营古籍闻名。校经山房,创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设在福州路中,其营业要目与扫叶山房同,“惟其印行五经子集等,则较扫叶山房为逊”。尚古山房,始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地址在牯岭路人安里,“出版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S313 - 1 - 68。

申时经济情报,“沪市出版业近况调查·古书业”,1935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 Q275 - 1 - 1858。

参见周振鹤编著:《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400页。

申时经济情报,“沪市出版业近况调查·古书业”,1935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 Q275 - 1 - 1858。

申时经济情报,“沪市出版业近况调查·古书业”,1935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 Q275 - 1 - 1858。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书局调查资料(1930-1950),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 Q275 - 1 - 1858。

详见“上海书业公所历史沿革”、“上海书业公所落成全体大会开会词及年会报告书(1914-1917)”,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S313 - 1 - 2 - 1、S313 - 1 - 2 - 8等。

详见“书业商会十年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S313 - 1 - 4 - 1等。

详见“书业商会十年概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S313 - 1 - 4 - 1等。

各种古书达数百种。鸿宝斋,设于四马路东华里,其营业除碑帖印泥画轴扇册外,尤以出版星相医卜子集等书出名。至于文瑞楼,出版古籍,营业种类、销路情形“与校经等略同”。同业之间,经营相仿,不久就有了版权纷争。扫叶山房一度状告校经山房抄印古籍 12种,围绕版权发生了冲突。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书业同业举行会议,予以调解,其基本情况为:“为调和扫叶、校经两家木板翻石印一节,兹由同业排解,所有校经抄印扫叶十二种雷同之书,凭众劝和,先印七种,其余五种缓缓再印。至各书价目,俟议定后由公所派发传单咨照各客俾沾利益。嗣后各家印出新书不再雷同。倘有不允,当照公所章程办理,现经彼此允洽作为议决,以全大局。”扫叶、校经两家签允,版权纠纷暂告结束。

在近代上海书业公所、书业商会中,涉及多位席家子弟,如席子佩、席永屏、席少梧(也有写席少吾)等。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体同业投票公举书业公所各职员,席子佩曾当选为总董,席少梧(调查员)为查帐董事。席少梧后又当选民国初年书业公所理事。在一份档案中提到,席少梧出自扫叶山房南号。在民国初年上海书业公所的会议记录中,多次议及扫叶山房的南北号,如“本年《快览》底子应将附属各种抽调亟拟推举承办之家,即公举扫叶山房南北号席君少梧、马君蓉孙担任。”可见,扫叶山房参与了书业公所的不少事务。

3. 扫叶山房的改制

1949年后,扫叶山房面临资产重估与改制。长期以来,扫叶山房资本采用股份制,乃席氏家族成员合伙经营。据调查,至 1950年 12月底,其资本总额为 68877887.49元,具体构成如下:

姓名	股份所占百分比	金额(元)
席念曾	28%	19285807.10
席仰高	18%	12398018.85
席韞孙	16%	11020461.20
席淑良	14%	9642903.65
席筱春	10%	6887788.25
席与晟	8%	5510230.60
席培均	6%	4132677.94

资料来源:“扫叶书店重估财产报表”,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 S313-4-39。

1950年 12月 31日重估财产后数额,资产总额为 103308088.97元,负债总额:12511047.51元,重估财产前净值 64412561.23元,重估财产增值额:26384480.23元。在“重估财产报表”上,负责人签章为席念曾,主办会计为席仰高。颇足注意的是,在存货明细表中,有关于图书的滞销、停销情况,从中可知当时图书滞销是大量的。

扫叶山房于 1951年 8月经上海市工商局核准更名为“扫叶书店”。书店位于河南中路 129号,电话 99872,主要业务:经营书籍。业务范围逐渐缩小,后又统一并入新华书店。一家历史悠久、存

申时经济情报,“沪市出版业近况调查·古书业”,1935年 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 Q275-1-1858。

“书业公所同业规章、各号牌名、著作权章程及重要文稿留底簿(1909-1912),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S313-1-120等。

“书业公所制订和修订章程向主管官署的报批文书和历年章程修改文本(1906-1925)”,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S3S313-1-1。

“书业公所会员名册暨董事及书业商团团员名单(1914-1929),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S313-1-23等。

“书业公所会议记录簿”,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S313-1-86等。

“扫叶书店重估财产报表”,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 S313-4-39。

续了数百年的民间出版机构就此消失。

三 家族文化与人文传承

从明代到民国,扫叶山房延续了数百年,其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家族对收藏、刻印书籍所抱有的特别情感。

一家民间出版机构承续时间如此之长,出版经历如此丰富,这在中国的书业经营史上也是罕见的。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比较关注经商家族的发展史,洞庭席家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经营活动的家族,其案例具有典型性。然而,仔细考察席家的经营史,存在着“连续”与“不连续”的断裂。谓其“不连续”,是从较长时段考察,由于改朝换代或时局的激荡,尤其是缺少制度的保障,使那些经商家族时常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其财富时聚时散,其子孙的职业承袭更不具有连续性。这是近世中国社会诸多家族共同面临的命运。所谓“富不过三代”,有家族自身的发展问题,但更深层次的缘由是受到时局变动、政权更替的影响,与整个社会的制度构建息息相关。然而,就在这种共有的大背景下,一些家族能经久不衰,其经营保持相对的连续性,才更显示这个家族的独特性。

洞庭席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经商家族,从明清到近代,一直以善于经营闻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他们的经营内容差异较大,明清时期席家人主要沿运河两岸、大江南北活动,在一些地方历数代之经营,与当地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着丰富的人脉、牢固的社会网络,活动区域的相对稳定给经营上的连续性创造了条件。从席氏在各地经营的货物来看,如棉布、蓝靛、丝绸等,这些都是席家几代人长期经营的品种。同时,他们开设典当,后又从事钱庄业,这与日后在通商口岸上海从事银行业,虽有一定的内在关联,但传统的典当业与近代的银行业毕竟区别甚大,而近代席家之所以能立足上海,扬名于十里洋场,与充任外资银行的买办有关,此时已转化为上海的买办世家、金融大族。最能反映席家经营上具有连续性特点的,恰恰是刊刻古籍、经营书业的“扫叶山房”。

席家与扫叶山房结缘,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深含着文化内涵,此与这个家族所具有的文化传统有关。

从席氏家训揭示的家族文化,到席家涌现出一批子弟对藏书、读书、著书、刻书的热爱,他们那份内在的对“书”的喜爱,数代传承,百年绵延。期间,洞庭席家的子弟,从东山到常熟、青浦、松江,到近代又涌向上海、汉口,不管地域的迁徙,还是生活环境的变化,但对“书”有一份共同的爱好。不单是扫叶山房的传承,即使做了买办的那些席家子弟,仍对书业抱有敬畏。作为洞庭席氏的后裔,席子眉、席子佩兄弟也继承了对书的“偏好”。子眉、子佩,原名裕祺、裕福,系左源公的后代,均出生于青浦珠里,前后任申报馆买办,英人美查在创办《申报》之时,后又分设点石斋印局、图书集成局等,皆命子眉“摄其事”。出版《点石斋画报》,筹划印刷《古今图书集成》等。席子佩后为点石斋印书局的华经理,“陆续添置石印机达十余部之多。”席子佩曾不惜巨资“礼聘通人,校刊九通,廿四史等书,廉价印行,以惠士林。”1906年,席子佩等人抱着“印刷事业关系全国文化甚巨”的追求,联合沪上名流,发起组建中国图书公司,聘“状元实业家”张謇为董事长,沈信卿为编译所长,借重他们的地位与声望,扩大公司影响。在此前后,他先后以重价盘受图书集成局、点石斋、申昌书室等,改组成为集成图书公司,专营印刷事业,此在中国近代印刷出版史上具有一定影响。此外,席子佩(裕福)还与沈师徐编辑《皇朝政典类纂》,全书22大类,凡500卷,其内容上溯清初,下迄光绪年间,主要是从清代诸家著述中汇集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料,包括清代历朝圣训、会典、则例、奏折、方

民国《青浦县续志》卷17“人物三”。

参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49页。

见席彭年所撰“席子佩先生哀启”。

志、全集、笔记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上海图书集成局刊印。席子佩本人一度担任上海书业公所总董,1906年当选为上海商务总会会员,其职业之一就是经营书业。结合席氏家族成员的爱好、家族的人文传承,考察扫叶山房承续数百年的变化,从中揭示内在的文化意义。

当然,由此涉及的另一问题也不可回避,即扫叶山房经营中的“家族性”是否阻碍了它在近代的发展。上海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源地,这里拥有全国最重要的出版社、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并建立起最完善的发行系统。由上海出版发行的图书与期刊,曾占全国出版总量的半数以上。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世界书局等近代上海的那些著名出版机构相比,无论在资本运作、经营规模,还是内部管理、发行渠道等方面,扫叶山房都无法望其项背。究其原因,扫叶山房毕竟是一家传统的书坊,长期以来,基本上保持着家庭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家族式经营在传统的书坊时代能保持一定的活力,并靠家族的文化遗产保持一定的优势,然而,当近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建立以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开始在中国出版业中发展,同时更激烈的竞争也开始展开。在近代出版业呈现的新格局中,传统的家族经营的书坊事实上面临着一系列的考验,是否需要采用股份制的近代企业形式,是否需要引进近代企业制度,且在市场的竞争中是否还能保持自己原有的经营特色。在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中,扫叶山房在编辑、印刷、发行等多个方面,应该说在面对读者、适应市场乃至书坊内部管理上也作了一些探讨,并进行了些许调整与改进,但总的说来还是固守传统的多,因此,近代的扫叶山房不是以资金雄厚见长,以出版规模取胜,而是一家维系与坚守着原有人文传统的特色书坊。

(责任编辑:秦 蓁)

《皇朝政典类纂》后由台湾文海出版社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予以刊印。

据1906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在该会的数据中,介绍了席子佩的基本情况:裕福(印),年四十岁,江苏青浦县人,候选道,住西藏路,董理书业,创办点石斋书局、大有榨油公司。第二年的名录里,席子佩成为商务总会的调查议董,执业改为“申报馆”,住址相应改动,居于宁波路。此后几年除继续担任商会总会的会员外,还被选为备董、书记议董等。

Abstract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 in Urbanization: On Wang Shi Jing Kong Case in Shuanglin County of Early Qing Dynasty SUN Bing

This paper starts from Wang Shi Jing Kong Case in Shuanglin County of early Qing dynasty, and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change between locals and migrants, gentries and common peopl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It reflects the accumulation, breaking out and solution to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paper also made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s on the form and significance of class classification.

Xi Family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and "Sao Ye Shan Fang" MA Xue qiang

Sao Ye Shan Fang is a book store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with a long history. Many books it had printed enjoyed high reputation in the publishing world and it had done much to preserve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Xi Family was the master of Sao Ye Shan Fang.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hange of this famous folk publishing agency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ulture and humanistic inheritance.

City Spa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Men of Letters in Shanghai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YE Zhong qiang

Due to the new changes in Shanghai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men of letters were deprived of their features of scholar - bureaucrat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ity space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created a city community and played down their ' Sanbu Complex ' and the scholar - bureaucrat feelings that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it.

Elimination of Shanghai People'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Subei People SHAO Jian

A large number of Subei people have migrated to Shanghai since modern times, and most of them did inferior jobs, which led t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m.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communication of all kinds of people in Shanghai, the prejudices and discrimination began to disappear. This reflects the progress of times and shows the tendency of allevi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Shanghai.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cology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Han Dynasty GAO Jun, Wang Gang

The paper prob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disasters and ecological damage. It points out that people in Han Dynasty did much damage to natural resources and led to a series of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s.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ure and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